

參政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067期·

新华通讯社编印

1957年5月7日·星期二

波、捷等国报纸刊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

【本刊讯】华沙各主要报纸3日都刊载了新华社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人民论坛报”刊载了广播稿的全文。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和布拉格其他的全国性报纸3日刊登了这个指示的摘要。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和“人民意志报”4日摘要刊登了这个指示。越南“人民报”6日发表了整风指示的消息，并对指示的五个部分作了详细的介绍。

【本刊讯】“纽约时报”5月1日以“红色中国的主义影响了波兰人——毛泽东关于党利用说服办法的意见受到华沙领袖的欢迎”为题发表了它驻华沙记者所写的消息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告诉波兰领袖们，在一个共产党社会内，甚至在一个共产党内，矛盾和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矛盾和分歧必须只以说服的办法来加以克服。据波兰代表团的成员之一的米·莱什为“政治周刊”所写的一篇详尽而坦白的文章说，这是中国人最近在北平同波兰人会谈时所提出的主要命题之一。

关于共产主义内矛盾的理论的重要性在于马克思主义曾经强调矛盾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

只要“没有敌人参加”，矛盾和分歧对党来说就仍然是非对抗性的。据莱什说，中国人认为在匈牙利，“在解决那些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的非对抗性分歧和内部矛盾的全国大规模讨论中有了敌人来参加”。

从中国人自苏联干涉匈牙利以来所发表的声明可以假定，在他们认为有“敌人”（一般是指资本主义，特别是指美国）参加了斗争的地方，中国人是愿意允许不用说服办法而采用武力的。

莱什报道说，中国人的论点所依据的是毛泽东所发表的历时四小时的演说的方针。这篇讲话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是却已经成为在波兰获得强大影响的一种特殊的中共观念形态的基础。

这一理论的教义之一——中国人很抒情地把它称之为“百花齐放”——在这里被认为是赞成波兰努力从苏联手中争得独立的一种表现。

莱什写道：中国人曾经向波兰人举一次大学生罢课事件为例，来说明甚至“错误的、不负责任的甚至反动的活动”都应该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办法来加以处理。从其他来源方面获悉，天津附近一个地方的大学生曾发生罢课作为反对课程要延长一年的做法的一种抗议。党的积极分子与学生们谈了“三天三夜”，最后以同意废除延长而解决了这场纠纷。据莱什说，中国人说，罢工罢课不应该禁止。但是，中国人认为也决不应该赞成罢工罢课，因为那样会影响生产。

路透社记者报道中共开始整风运动

【路透社北京5日电】（记者：漆德卫）中国某些地方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军官们今天正在同农民和工人一起进行一点体力劳动。他们是将成为一次全国性的运动的先锋，这次运动是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发出指示后展开的，指示要求各级领导人通过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方法来克服官僚主义。

这次对官僚主义的进攻是刚刚开始“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官僚主义在中国的某些组织里正在成为一种束缚力量。

这次运动是一个通过培养“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从思想上同中国目前的某些问题（特别是“领导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进行斗争的方法。这次运动将进行一年左右，并且将扩大到政府和党的生活的各个阶层。北京和中国其它地方的许多政府组织都在周末举行会议来讨论如何能够最好地进行这个运动。

在九月以前，运动将只限于国家机关、大工厂和各大学的范围之内，但是在今年秋天，它将扩大到基层行政单位和党员群众。

在这次运动中，在很大程度上将通过学习毛泽东先生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历时四小时的讲话来进行教育。这次讲话包括一个几乎是涉及中国事务的每一个方面的十二点指示，名叫“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全国比较高级的组织在过去几星期里已经学习了这次讲话。由毛泽东先生亲自指示过的思想突击队正在宣传这次讲话。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再次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教育党员和官员们，特别是那些正在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罪恶的人。根据这个指示，不得使用任何一种武力，整个运动将采用说服和自我帮助的办法。

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这次运动一点也不会限制在过去一年中明显存在的实现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和使内部紧张状态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的趋向。

这个指示具体谈到——这也是毛先生的讲话的主要问题之一：这次运动应当加强关于对中国非共产党人士的“长期共存”和在知识分子和创造性艺术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虽然这次运动主要是在共产党——现在总共有一千一百多万党员，是

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内部进行的，但是非党人士也得到通知说，他们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这次运动。

“法蘭西观察家”周刊

評我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周刊4月25日（编者注：“法兰西观察家”是以“中立主义”为标榜的托派刊物，主张法国中立，反对美国在欧洲搞军事集团，反对法国完全受美国的控制。它的言论也反苏反共。）刊载费日多写的一篇“毛泽东——共产主义世界中主要的理论家”的文章说，一位从中国和苏联旅行归来的法国共产党要人最近肯定说：“共产主义世界今天只有一个人够资格称为理论家——他就是毛泽东。”人民中国的这位元首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报告似乎证实了这种意见。北京“人民日报”拖了好些时候才在4月13日的社论里透露了这个报告的若干主导思想。实际上这个报告表明毛泽东渴望推翻斯大林的教条而同列宁重新结合起来，更确切些说，是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能应变而重实用的列宁结合起来。

毛泽东报告的主旨是一个理论问题，这个问题早在斯大林逝世之前就是苏联理论家们所关心的（请参看斯大林和雅罗申科之间的有名的论战）（编者注：这里是指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雅罗申科的批评），最近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又使得这个问题成了燃眉之急的现实问题。这个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出现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在一个由据说是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服务的党控制的无产阶级国家里这些矛盾是否有权利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对党表示反对和不满，是否就一定具有反动本质和反动思想？

毛泽东在他的报告里回答了这些问题。回答的方式是把“根本的对抗性矛盾和冲突”同“非对抗性矛盾”区分开来。

不错，斯大林本人在他的政治遗著中已经承认党犯的政治错误可能引起内部冲突；但是，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之处在于它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要坦率得多。他是用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之间的“看法差异”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而这种差异则是由于国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各自所处的地位而造成的。

然而，毛泽东看来，这种矛盾毫无可悲之处。恰恰相反，明智的领导可以从这种矛盾中吸取教训来使制度不断完善和改善。很难不看出：毛泽东对辩证性困难所产生的矛盾给予这种积极估计，是具有道地的中国气味的，可以说是孔夫子式的中国说法：他想使这种矛盾成为促使他那种开明的、家长式的、谦逊的专制主义进步的泉源。因此，同斯大林制造一大堆虚伪论据来掩饰人民政权内部存在的许多紧张情况的作法相反，毛泽东建议人们尽量公开地讨论这些紧张情况。

应该强调指出，毛泽东比谢皮洛夫之流或波斯伯洛夫之流运用来自如得多的这种辩证法，无论如何，并没有使他像波兰或匈牙利的某些有资格的修正主义共产党人那样承认这样一点：必须让对抗表现出来，必须让“普通人”用宪法规定的办法来监督政权。这一次又是这样：毛泽东的主张酷似从前某些改良派君主，他们致力于改进官僚制度，然而根本不想放弃他们的那怕是一部分专制权力。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是寸步不让的，他而且维护党和人民高度一致性的教条。他说，中国共产党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的联系。这就是把化身学说运用于共产党方面。尽管这样说，毛泽东倒是确实希望共产党干部配得上承担委托给他们的崇高使命。他希望使共产党领导人员有道德修养，因此他使这些领导了解：负责干部应该成为“好东家”；他们在同“普通人”和下级干部相处时应该避免一切自高自大表现；他们应该用说服的办法而不是命令的办法；他们应该保持同被管理者的接触，特别是他们对于希望取得的结果不应该表现出急躁。

在上述文章当中插入斯大林的照片，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如下：斯大林提出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是这一思想：在苏联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矛盾，只存在这个社会主义新国家和资本主义包围之间的矛盾，而在国内，则是几乎全体人民和旧习俗之间的矛盾。1939年（就是说，在极其血腥的清洗之后不久），他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说：“国内进行镇压的职能已经多余，它已经消失，因为已经消灭了剥削，剥削者已经不存在，已经没有镇压的对象……现在，我国的国内主要任务是和平组织经济、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惩戒机构和情报机关，其锋芒不再指向国内，而是指向国外，指向外部的敌人”。

在卡薩布蘭卡博覽會上

中、波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展品特別动人

【美联社卡萨布兰卡4日电】共产党国家星期六又一次企图获得非洲市场，它们在卡萨布兰卡博览会上的有些商品的价格仅及同样的美国产品的50%。

五个共产党国家在这个博览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展览处，其中大部分摆满了采矿机器和农业机器。这五国是红色中国、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

虽然美国的展览处是最大的，并且展出了表明美国教育、居住和农业方面的进步的动人的展览品，但是群众似乎对共产党的展品更感兴趣，主要是由于价钱便宜。

捷克斯洛伐克的采矿设备标价约比同类的美国货低50%。

共产党削减价格的做法必然会在缺少钱的北非国家中获得成功，虽然摩洛哥本身由于财政困难甚至不可能购买苏联货。

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几个问题 (摘要)

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耶日·莫拉夫斯基

编者按：这是莫拉夫斯基同志2月16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宣传员训练班的讲话，已经在波兰印成单行本出售。本刊摘要译载如下：

首先谈两点注意：

在党的政策转变的时期，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特别活跃，必须加强与之斗争。

阶级异己势力利用民主化运动也活跃起来，挑拨同苏联的关系；目前的斗争特别复杂，引起人民思想混乱。

第一，为什么党在现在如此大力地提出同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呢？这是不久前同志们所收到的政治局给党组织的信中所提到的主要问题之一。党把它看作是当前的重大问题，是因为这两个危险经常在转变时期，在党政策的变化时期以特别尖锐的形式出现，如不与之斗争，就可能削弱甚至歪曲党的新政策的实现。

我们看到许多党组织和党的活动家的积极性仍相当差，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首先就是不清楚和政治上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又是由于党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的分歧造成的。

第二，在最近期间，由于我们所要解决的任务和斗争特别复杂，因而政治活动阵线、阶级斗争战线以及党内外各种倾向的战线上就异常混乱。我们以争取我们的生活的民主化的斗争为例吧。大家知道，除了党内为民主化进行斗争的活跃的创造性的力量外，自由主义势力和阶级异己势力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它们希望另一种同党的要求不同的民主化，这种势力当然对这个斗争的过程有影响。党的七中全会就已提醒过这种危险，但那时对它进行斗争不够。

又如另外一个例子，正确建立我们阵营各国间，特别是波苏间关系的斗争。全国人民都支持在这种关系中应有平等和主权的要求，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动机。我们要求改善这种关系，是因为我们想加强和苏联的同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别人却是想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想把波兰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分开，甚至以波兰来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并且还交织着各种要求和倾向，因而使斗争过程异常紊乱，从而引起人民的思想混乱。

那些这样说的同志是不对的，他们说，为什么老是谈论党内的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倾向，而不老谈党所面临的正面任务呢。问题在于完成这些正面任务需要把党动员起来，而把党动员起来只有党队伍思想一致，只有了解党的路线时，才可能。但如不对那些加深了对党的正确路线误解和不相信的东西的有害性和虚伪性加以解释，就不能达到这点，如不同那些把这个路线引上歧途的东西作斗争，就不能达到这点。

现在我来谈正题，谈四个问题：（一）政权问题；（二）工人阶级及其党对其同盟者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三）党及其领导作用的问题；（四）对国际工人运动及对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态度问题。

一、政权问题

波兰的民主化工作有两个基本方面：扩大劳动群众参加政权和经济管理；克服官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从群众情绪来看，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了。既要取得劳动人民的支持，也要有锋利的镇压敌人的政权机关。不能忘记阶级敌人仍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近几月来，我们党正在进行着改善波兰的行政制度和使之民主化的工作。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基本问题。一、扩大劳动群众参加政权管理和国民经济的管理。二、使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摆脱官僚主义。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党和政府的领导采取各种具体的措施，有的已付诸实施，有的正在拟定，象扩大由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议会、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保证行政机关不超越这些政权机关，而要作为执行机关受它们的监督等。又如为克服经济管理和行政部门等的过度集中而进行的斗争等。应该指出，在工厂中实行工人自治也属于加强群众对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这类措施，现在正在发展的和我们希望劳动农民发展的各种形式的自治或合作组织也属于这类措施。

如果我们愿意不是宣言式地而是严肃地对待列宁主义关于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越来越多的千百万工人、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国家管理的原则的话，那么，很显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这就是党的意图，这就是党的路线。

那么，在这些问题上，脱离党的路线的表现何在呢？

首先就是可能遇到的宗派主义观点。有些人，他们以过去几年的模型来为我们国家的工农性质和无产阶级专政大声疾呼，同时也以明显的保留和不时讥笑来对待我们扩大议会和人民代表会议权限的努力，有时甚至否定成立工人自治的正确性，他们认为实际上它会削弱或者甚至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让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波兰有无产阶级专政吗？当然有。许多人认为，过去专政多，现在专政少。这是绝对错误的和

太简单化了看法。无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减弱，而只是现在它在或者才开始在更好和更正确地实现着。

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把它看作是劳动农民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专政。因此，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是正确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是真正实现这个专政的条件。因此难道可以说过去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吗？那时我们经常把工人群众的作用降低到一支大军、士兵的作用，而且还不是一支现代化的和社会主义的大军的士兵，如果谈到保持这支军队的纪律的形式，那么这种纪律经常不是建立在自觉的原则上，而是使人回想起普鲁士的操练。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实际上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过去在我们这里诚然存在着民主机关，它们在法律上享有无比广泛的民主权利，但实际上，它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却是严重限制劳动人民民主权利的表面装置。

有人以七中全会后反动势力活跃的某些事实来证实现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有某些削弱的理论，反动势力活跃是真的。但它不是偶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们纠正过去错误的观念和不好的实践的时候，反动派如果不想加以利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如果不想利用民主化过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不称其为反动派了。

但是我们要自问，虽然国内反动势力活动显著活跃，然而现在人民政权到底比过去、半年前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呢？不管各种借口，它今天是无可比拟地加强了。只需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够了：波兹南事件是在八中全会以前发生的呢？还是在以后？

第二个例子，让我们把波兹南事件和去年12月在斯切辛发生的骚动事件比较一下。这两个事件有着基本的不同。在波兹南是工人群众在街头游行，以后流氓和各种敌对分子竭力参加进去；全国对波兹南事件的感觉是这样：这个事件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而在斯切辛则是一批流氓和敌人走在街头，没有群众的支持，在全国是指责斯切辛事件的情绪，驱散这些示威游行的敌对份子和暴徒的与其说是民警还不如说首先是工人。

第三个例子，也是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议会选举的结果。选举结果是居民中的各种倾向，各种要求和担心的总汇。但是决不能降低这次选举的成绩。事实是绝大多数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支持共产党人，而波兰的共产党人也由于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而得到议席。在议会选举中，波兹南投全国统一阵线名单票的人占投票人数的99%，在这个名单中的共产党人斯彼哈尔斯基同志得票最多，占第一位，而斯彼哈尔斯基同志在选举运动中及与选民会见时曾给反动派以无情反击。我想这件事是有说服力的。

因此，不管是从政治方面来看，还是从群众情绪来看，人民政权今天是无比地更加巩固了。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即人民政权机关在许多地方还是很弱，没有表示出应有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在反动者面前经常束手无策和退却。这自然是一种不好的和令人不安的现象。但是问题并不是这样：人民赞成我们而解散政权机关好呢，还是政权机关有效率而使人民反对我们呢。

在我们面前，没有而且也不应该有这种选择。我们两者都要，既要劳动群众支持我们，也要有效的锋利的对敌人实行镇压和强力的机关。但是，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支持我们的时候，在反对敌人的斗争中能保证得到居民的经常合作的时候，才可能使政权机关真正成为适当而有效地打击敌人的锋利武器。

有必要使党员在政治上了解我们行政机关的工作，使我们的党机关和政权机关不要忘记现行法令，不要忘记只要未得到相应政权机关的合法许可就不能召开任何群众大会和成立任何组织。但不幸，这类事件最近在我们这里曾发生过。一些政治面目大有可疑的组织成立了，并举行了某些不存在的联盟或协会的会议等。

有些人，他们真诚地希望民主化的发展，但忘却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仍存在着阶级敌人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怎样才能大约地理解在这些问题上的各种修正主义的观点呢，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在“直言”周刊这类刊物上看到它的具体形态。“直言”周刊是个很活泼的刊物，不能否认它的编辑部在有时正确的批评中以及所提出的许多正确建议中的良好意愿、勇气和战斗性，但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个周刊编辑部的许多同志不了解国内已经发出的伟大而重要的变化，不了解转变已经发生。他们不了解在批评错误时不能提出各种小市民和自由主义的破坏原则的观点。许多同志的轻率态度是最显著的，他们作得非常起劲，正像俄罗斯的一个谚语所说：“我不知道，我走向何处，但我走得很坚定。”

从文化刊物和“直言”周刊上所出现的某些论政权制度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类的理论，说波兰直到现在所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他们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某种特殊体系：他们说在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中产生了官僚阶层，这个阶级有着自己特殊的阶层意识，他们与工人阶级相对

(下转第三版)

(上接第二版)

立，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还说应该首先粉碎这个官僚阶层，而后才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势力的自由角逐和生产者的新的自由的国家。

是不是我们出现过可以被人们认为是构成了官僚阶层的这种现象的某些因素呢？是的，出现过。我们一部份政权机关脱离劳动群众就是过去时期偏差的最坏的表现之一。这种情况现在仍未完全克服。而更甚的是官僚主义尚未克服。党看到了这种现象，而且也正以各种方法与之作斗争。但不能把对官僚主义的正确进攻在与官僚阶层作斗争的口号下变为对我们整个政权机构的攻击，要求摧毁这些机构，因为这只符合反动派的愿望。

在我们笼统地谈论官僚的时候，也还指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被调到政权机关去的人而言，这些人以不寻常的忘我精神将自己的精力和劳动贡献给了工人阶级，他们都是好的大公无私的同志。是不是应该反对这些同志的官僚化呢？当然应该。但也应该记着，工人阶级需要强大的国家。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如果认为没有行之有效而适当的国家机关就可以改变社会关系，就可以和阶级敌人作斗争，那是空想。难道工人阶级一定要放弃目的在于镇压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的强大的政权机关吗？

另外，我们注意到生产者的自由社会的理论。如果要谈一些关于工人自治的文章，就会得出这种印象：他们希望把整个国民经济分为工人股份公司，使各企业间的力量自由竞争。这是一种胡说，也是反动的，因为这会妨碍经济的发展，会导致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和以牺牲一些企业来使另一些企业发财致富，总之会导致这些计划的拟订者肯定希望避免的一切情况的发生。应该明确指出，工人阶级首先就是通过自己的国家实现自己在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国家订计划，国家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其次是工人阶级只是通过对各个工厂的具体领导来实现自己对经济的领导，在全国计划范围内和通过职工借助工人委员会直接参加企业管理来实现自己对经济的领导。

我们将来在共产主义中将实现没有国家机器的生产者的自由社会。但今天，我们没有丰富的财富，国内外仍存在着阶级敌人，生产力及劳动生产率水平有限，仍不高。而且我们的社会觉悟及道德水平比共产主义所应该有的那种水平还差得很远，所以提出这个口号是空想。因此如果坚持今天就应该立刻实行，那这种空想的政治效果不是使我们接近目标，而是使我们与之背道而驰。

客观地考虑一下，在某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要求有着显然反动的性质，他们要求现在在我们所处的这种政治条件下使一切团体都合法化，只要他们愿意，而不管其真实目的为何，以便实现国内政治势力自由角逐的原则。

这个问题的“科学”概念如下，“直言”周刊上题为“呼唤”的文章中说：“或者民主是谎言，或者民主是民主。”甚至在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见解中也缺少个形容民主的形容词。因为假如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即促进过渡时期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的话，那末它就不能保证和不会保证“各种力量的自由角逐”；不能给和不给人民自由的敌人和工人阶级的敌人以自由。

二、关于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的关系问题

现在我谈谈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者的关系问题。

对城乡小商品经济不能用行政强迫手段。过去曾经过分排挤手工业和小私有生产者，造成市场供应发生困难。波兰的小商品经济是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危险的，但是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城市和农村的私有的小商品经济是有自发地发展向资本主义的倾向的，但也可能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党的政策在于保证使那些阶层向社会主义靠拢。只有那时候，即不用行政强迫手段的时候，那些阶层才能真正的靠拢社会主义。对待这些阶层时采用强制手段只能使他们反对和远离社会主义。至于手工业和小私有生产，我们过去对它们的生产采取了无根据的不正确的过分排挤和限制的办法。举例说：战前波兰有50多万手工业作坊。战后初期，还有30万多个，但是到1955年只剩下18万个；同时合作作坊或国营作坊又往往不能替代那些作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干脆采取取消的办法，留下了空白，这是人们认为小手工业工场减少，则社会主义就会增多之故。而事实却相反，因为消灭手工业和小生产者，使许多人都离开了我们，而那些本来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者的。

因此我们把发展手工业作为一种任务。至于非手工业的小私营生产，我们的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某些部门中不正确地、对国民经济有害地被破坏的企业。这里特别是指建筑材料的生产。

我们是否看到了小生产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增长的危险呢？显然是有的。不能对此闭着眼睛。但是我们也有许多阻止这种危险的手段，我们的办法是在小生产的消极效果开始超过积极效果的地方进行相应的政策的改变。

在这个政策的实施中又有修正主义偏差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威胁着我们。关门主义者不是不想了解这个对小生产的政策的正确性及其意义，就是绝望地说资本主义泛滥在威胁着我们。

什么是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泛滥，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说明。1955年波兰工业与手工业中的小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比例不超过工业总生产的4%，商业中则为整个商业周转量的2.6%多一点。苏联在与我们相似的时期中，在全盘集体化前，1928年相应的数字为：工业方面17.3%，商

业近24%。目前由于在手工业，小生产方面实施新政策的结果，在总生产中它们的比例将增长，但是在将来这些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在我们总的工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是微小的，基本上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但是这政策却使我们能较好地满足经济需要，较好地供应人民很多我们国营工业生产不足的货物。同时又能使我们更好地来影响这些小生产者的大部分，把他们纳入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

假如对小生产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闭目不看的话，则修正主义的错误就威胁着我们。实践立刻会证实这一点的，譬如说假如我们发展小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办法，不采取吸收它们的资金、资本；而采用国家信贷、帮助，假如我们关闭国营商店而开设私营的，取消社会主义企业；而代之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话。因为这种做法与我们党的经济政策的路线并没有很多共同之处，或者说毫无相同之处。因为问题不在于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来代替社会主义企业，而在于通过生产网、服务业网，在某些情况中要通过商业网以及手工业和小生产者来补充社会主义网，这是指在国营或合作社营还没有达到的部门或地区发展这种企业网，同时指的是要吸收积聚在各种私营企业主手中迄今未加利用的资金和资本，即吸收可能成为企业主的人的资金。目前这些资本不但不服务于国民经济，且常常由于私营企业的投机活动而危害国民经济。

过去对民主党派限制过多。应该同它们长期合作，它们的活动应有独立性。哥穆尔卡说过：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愈大，则其独立性也愈大。同时也要注意民主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加紧活动。

同上面所说问题相联系的还应谈谈我们同盟政党的关系问题。在过去的时期中往往认为它们的作用是党与群众间的传递带。这还不算，我们还渐渐地缩小和切短这些传递带。如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失去了自己的日报，他们在青年运动中的积极性曾受到限制。各级党机关不关心和这两个党的合作。

这样的关系不利于他们，同样也不利于我们，因为这样做，我们自己剥夺了他们在和我们合作并承认我们党的领导作用条件下能独立自主地所起的积极作用。今天这些政党活跃起来了而且加强了自己的活动。我们指出他们所

面对的活动的远景，我们强调我们党与他们长期合作的必要性，我们强调他们活动的独立自主性。

在我们的观念中什么是独立性的界限呢？界限是由这些党派对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态度所规定的。我们与他们合作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一起支持社会主义。正如哥穆尔卡同志在某一次演讲中所提的那样，这些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确定了独立性的界限，他说：这些党派的贡献越大，越起作用，则其活动范围愈广，独立性也愈大。

在实践中有那些离开党的路线的倾向在威胁着我们呢？可能是继续宗派主义的做法即不考虑那些党派的特点，而机械地向他们发指示和指挥命令的做法可能威胁我们。显然地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威胁，假如我们不愿看到这一点，即这些党派活动的活跃也促使了那些想破坏与我们党合作的分子的积极活动。这些分子在过去曾展开过广泛的活动，企图建立所谓民主青年联盟，它与民主党没有多少共同之点，相反的愈来愈明显地聚集有天主教民主党分子、各种类型的天主教的政治活动分子，尽管他的名称是民主青年联盟，但是可以成为右派政治斗争的中坚。

因此，在与其它政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既看到我们政策中可能产生错误的两种源泉，同时又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实施正确的、能加强社会主义力量和削弱社会主义敌人的政策。

过去侵犯过宗教信仰自由，使敌人利用来反对我们。现在不得不作让步，准许教会有较宽的活动范围。从长远来看，这样是有利于我们扩大在教徒群众中的影响的。

在谈到加强社会主义力量时，也应该谈谈我们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因为很多人认为最近所施行的措施是削弱社会主义的。

绝不能把这事看得这样简单。过去对教会和宗教我们犯了严重的宗派主义的错误。事实是1950年4月政府和波兰教会间的协议在实践上没有被遵守。党不能不考虑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教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教导我们，宗教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的，行政手段只能作为辅助的附带的手段，主要的应该靠思想政治影响。

过去我们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宗教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人民政权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只一次地讲过，不允许滥用宗教从事政治斗争，但是问题不只在是否反对者滥用宗教，而在于是否由于我们的错误政策，为他们创造了反对我们的条件。

在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中的宗教崇拜变成了一种迫害和诽谤的对象时，当宗教活动自由不止一次地遭到侵犯时，特别在青年中采取的各种为使青年放弃宗教活动的措施时，当然僧侣就易于滥用宗教在政治上反对我们。

因此，这方面的正确的政策，必须是通过满足教徒宗教的要求和允许执行宗教崇拜，来保证教徒自由的感觉，以这种方法来阻碍挑衅教徒反对人民政权的任何企图。同时正确的政策应当是不准对非教徒歧视，保证他们有可能有系统地发展全面的宣传科学世界观的工作。唯有在保证宗教崇拜自由的条件下，唯有在驱除在宗教事务上的愤激狂怒情绪时，才能真正的在教徒和非教徒间展开辩论，展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和科学的世界观；才能谈得上反宗教宣传的有效性。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三版)

以上所述就是对教会和宗教正确政策的主要原则,但是在过去,这些原则遭到了破坏,过去这些原则被破坏,现在我们得到了报复,并使我们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让步,特别在学校的宗教课问题上。但是可以深信,当我们的政策得到发展时,当这方面的愤怒情绪消失时,当宗教课从前被视为禁课和被苦难及牺牲的灵光所笼罩,现在失了这一圈灵光而成为选修课时,无疑是会产生比以前更有利的条件以科学的世界观来影响青年。

某些人说,我们目前的政策使教会扩大了影响。无疑目前教会有较宽的活动可能,但是假如你看这政策不从一天的观点出发,而从今后的远景出发,那末情况就完全相反。因为我们现在已获得较前大得多的在教徒中进行活动的可能性,我们已能较前更自由地深入广大的教徒群众。

农村的新政策首先
要提高农业生产。

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很大的退步,这是过去强迫命令的结果。从前在农村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使中农甚至小农同富农一起反对我们。现在改变了政策,农村中的阶级敌对矛盾将突出呈现出来,中小农才会认识我们是同盟者,我们将帮助他们进行反对农村资本主义的斗争。

现在我想简短地谈一下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在农村的新政策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因为这是发展波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我们的新政策同时也要使劳动农民的经济政治的积极性提高,没有这一点就谈不到真正的农村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在过去,恰恰相反,我们虽提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但庞大的官僚机构却窒息和驱散了农民的主动性。

波兰农民在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农业小组、农民信贷、互助组等方面有丰富的传统。农民的这些简单的组合,列宁称之为到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的桥梁。但是,为了想使国家掌握一切,我们曾烧毁了这些桥梁,并以官僚的国家机构替代这些农民的社会组织。这样不是便利反而阻塞了农村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更广泛地发挥劳动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主动性。

目前我们在农村生产合作事业上有很大退步,退步的表现即是大部分合作社的解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大部分合作社与其说是靠联合农民的内部联系而存在着的,不如说是靠外部的行政压力或是以国家帮助建立起来的不健全的温室而生存的。健康的生产合作是不能在这种条件下发展的,最近确实不但解散薄弱的合作社,而且健康的强的合作社也跟着解散了。过去年代中由我们积极分子所积下的不小的生产合作的成就被糟塌了。我们应从这一切得到教训。

新政策是否特殊照顾了富农呢?不!新政策还是保持累进税制和累进的义务交售制;但是取消了过去负担使较大的农户不致破产。新政策是否放弃帮助小农呢?相反地,在新指示里谈到了减少占有二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的义务交售额。新政策是否放弃农村的阶级斗争呢?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生硬的教条的理解这个问题。

从前,我们对农村一直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方法,不只使富农反对我们,而且使整个农村反对我们。过去中农甚至小农所反对的人不是富农,而是收购机关、税务人员、我们整个的行政机关,甚至是我们的党的机构。由于我们的错误的政策,不管我们的意图如何,使农村包括富农在内团结起来反对国家,而农村内部的敌我矛盾却退到第二位去。

现在我们改变了政策后怎样呢?农村的内部敌我矛盾必定会出现的,因为它存在着。农村的阶级斗争不会再被农民认为是从外部输进的生硬的口号,而会从农村内部关系中生长起来。在这个斗争中,国家当然不是中立的,那时国家在中农甚至部分小农的意识中不再是反对者,而是同盟者和朋友了。他的会认识到国家是他们在反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斗争中的帮助者。

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党的组织才能成为农村大部分人的领袖,不仅在生产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在增强农村社会主义的愿望和力量的斗争中成为农民的领袖。

这些就是我给予对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批评的辩驳。

但是有些地方也出现有另一种有害的观点,即不仅未见到而且甚至否认农村有不同阶级存在。在我们的同志中可以碰到这种人,他们热衷于荷兰的或比利时的具有高度单位面积产量的农业,但是他们却忘却了荷兰和比利时农村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对农业工人的剥削。任何想把这样的生产关系搬到我们这里来的企图,都意味着以牺牲中小农来支持富农,大部分中小农也就必然反对我党。也有这样的同志,他们在考虑生产合作是否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指出比把农民联合到生产合作更好的别的社会主义形式。

我认为,对农业集体经济的误解与其说是起源于集体经济思想,不如说是起源于在实施这个思想时所犯的错误的,或者是起源于譬如说苏联实施集体化的特殊情况。这些误会是由于采用强迫入社手段时所引起的,是由于国家过于干涉合作社所造成的。因为这样农民感觉不到自己是合作社的主人。

因此党的新农业政策是要消除这些错误,并且在其实实施过程中应给那些投降倾向以打击。

(全文明日续完)

美通訊社宣傳蔣幫和南越因华侨問題爭吵

蔣介石緊急會商對策 傳美國可能出面干預

【美聯社台北5日電】蔣介石總統星期日同他的高级顧問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討論他的國家同南越之間日益惡化的局勢。

自從南越宣布凡是在南越出生的華僑都得成為越南公民而毫無選擇自由以來,兩國關係就緊張起來。國民黨一再抗議而毫無結果。

星期日召開會議是由于有消息說,西貢的國民黨公使館再次遭到的騷擾,在這次騷亂中,使館的一樓遭到破壞。

官方沒有透露任何消息,但是據信,會議決定堅持政府的這項建議:在越南出生的華僑中,凡是希望保留他們的國籍和前來台灣的,都可以在台灣重新定居。

同時,台北報紙主張由美國斡旋,設法使這個糾紛獲得解決。沒有消息透露蔣和他的顧問是否決定為此向華盛頓接洽。

同時,這裡的外交部發言人江易生要求在越南的華僑通過和平的、有秩序的方法表示他們的願望。

【合眾社台北5日電】消息靈通人士今天說,美國可能被請求協助調解國民黨中國同南越之間關於華僑國籍問題的劇烈多端;這個問題使兩國的關係有破裂的危險。

這些人士說,已經有人對美國官員們進行試探。美國官員可能在南越總理吳庭艷到華盛頓以後同他討論這個問題。

美國在亞洲的這兩個主要反共盟國之間對於這一問題長時間的爭端,已經嚴重到可能使兩國的關係趨於破裂;東南亞的大約一千二百萬華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西貢和台北。

來自西貢的尚未証實的消息說,部分華僑已經開始流入共產黨的北越,因為他們在那里會受到較好的待遇。

國民黨中國立法院日益強烈地主張同南越斷絕外交關係,但是消息靈通人士說外交部反對這種過激的行動。但是今天看來中國首都的人們幾乎一致主張國民黨中國對南越採取堅決行動,否則它將在東南亞各地千百萬華僑面前喪失威信。

消息靈通人士說,某些政府人士主張請美國勸吳庭艷總理和緩他的態度。他們說,假如吳庭艷堅持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他會給其它亞洲國家造成先例,而使國民黨人束手無策。這可能促使千百萬華僑轉向紅色中國。

此間主張同南越斷絕外交關係的某些有地位的官員指出,南越對國民黨中國的友好作法從來沒有反響。雖然蔣介石政府在西貢駐有外交使團已經相當久,但是南越至今還不肯在台北設立公使館。這使國民黨人感到不快。

【中央社台北4日電】關於越南政府強制在越土生華僑歸化問題,此間十個人民團體於4日致電旅越華僑表示支援,同時並通電海外各地區全體僑胞一致展開聲援工作。

~~~~~  
一批南越華僑  
返國到澳門  
~~~~~

【合眾社澳門5日電】有二百零七名南越華僑在去共產黨中國途中在這個周末到達這塊葡萄牙殖民地。據運送這批華僑到達這裡的香港船隻,“泰波山號”駐這裡的代理人說,西貢還有六百多名華僑等待著乘船經澳門到紅色中國去。

這裡的觀察家們相信,這次華僑大批退出南越,是由于越南總統吳庭艷最近發布了一項一切出生越南的華人必須入越南國籍的命令。

五一柏林上空出現新式噴氣機

西方專家看到圖片都感驚訝

【美聯社柏林3日電】共產黨東德星期五宣稱,它的新空軍已經由俄國裝配了最新式的蘇聯戰鬥機——超音速的米格十九噴氣機。這個消息是正當盟國專家們對於東德軍隊在全國規模的“五一”節遊行時展示的新式俄國武器的規模表示驚訝的時候宣布的。

雖然匈牙利和波蘭曾經表明衛星國家軍隊能夠怎樣反抗它們的蘇聯主子,看來俄國決定把十萬人的東德武裝部隊變為有效的戰鬥機器。

共產黨宣傳說,東德加強軍備“是對西德變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個原子基地一事的答復”。東柏林的共產黨報紙“柏林日報晚刊”刊載了可以飛得很高的掠翼式米格噴氣機在“五一”節的檢閱飛行中經過德累斯頓上空的圖片,並且注明這些飛機是“最新式的米格十九噴氣機”。其他東德報紙只標明這些噴氣式飛機是東德空軍部隊。

米格十九一直被說成是俄國用來對抗美國的F一百噴氣式戰鬥機的。東德地方報紙刊載的圖片表明,東德陸軍開出新式俄國中型T五四重坦克通過馬格德堡街道。東德軍隊只在距西德邊境二十五英里的馬格德堡開出了這種坦克參加“五一”節慶祝式。

研究東柏林“五一”節慶祝式圖片的盟國專家們發現,東德軍隊裝備著許多配有以前從未見過的觀測儀器的高射炮。東德還第一次顯示了新型俄造大炮、反坦克炮和兩栖裝甲運兵車。

(上接第三版)

以上所述就是对教会和宗教正确政策的主要原则,但是在过去,这些原则遭到了破坏,过去这些原则被破坏,现在我们得到了报复,并使我们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让步,特别在学校的宗教课问题上。但是可以深信,当我们的政策得到发展时,当这方面的愤怒情绪消失时,当宗教课从前被视为禁课和被苦难及牺牲的灵光所笼罩,现在失了这一圈灵光而成为选修课时,无疑是会产生比以前更有利的条件以科学的世界观来影响青年。

某些人说,我们目前的政策使教会扩大了影响。无疑目前教会有较宽的活动可能,但是假如你看这政策不从一天的观点出发,而从今后的远景出发,那末情况就完全相反。因为我们现在已获得较前大得多的在教徒中进行活动的可能性,我们已能较前更自由地深入广大的教徒群众。

农村的新政策首先要提高农业生产。

目前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很大的退步,这是过去强迫命令的结果。从前在农村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使中农甚至小农同富农一起反对我们。现在改变了政策,农村中的阶级敌对矛盾将突出呈现出来,中小农才会认识我们是同盟者,我们将帮助他们进行反对农村资本主义的斗争。

现在我想简短地谈一下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在农村的新政策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因为这是发展波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我们的新政策同时也要使劳动农民的经济政治的积极性提高,没有这一点就谈不到真正的农村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在过去,恰恰相反,我们虽提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但庞大的官僚机构却窒息和驱散了农民的主动性。

波兰农民在组织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农业小组、农民信贷、互助组等方面有丰富的传统。农民的这些简单的组合,列宁称之为到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的桥梁。但是,为了想使国家掌握一切,我们曾烧毁了这些桥梁,并以官僚的国家机构替代这些农民的社会组织。这样不是便利反而阻塞了农村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应该更广泛地发挥劳动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主动性。

目前我们在农村生产合作事业上有很大退步,退步的表现即是大部分合作社的解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大部分合作社与其说是靠联合农民的内部联系而存在着的,不如说是靠外部的行政压力或是以国家帮助建立起来的不健全的温室而生存的。健康的生产合作是不能在这种条件下发展的,最近确实不但解散薄弱的合作社,而且健康的强的合作社也跟着解散了。过去年代中由我们积极分子所积下的不小的生产合作的成就被糟塌了。我们应从这一切得到教训。

新政策是否特殊照顾了富农呢?不!新政策还是保持累进税制和累进的义务交售制;但是取消了过去负担使较大的农户不致破产。新政策是否放弃帮助小农呢?相反地,在新指示里谈到了减少占有二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的义务交售额。新政策是否放弃农村的阶级斗争呢?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生硬的教条的理解这个问题。

从前,我们对农村一直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方法,不只使富农反对我们,而且使整个农村反对我们。过去中农甚至小农所反对的人不是富农,而是收购机关、税务人员、我们整个的行政机关,甚至是我们的党的机构。由于我们的错误的政策,不管我们的意图如何,使农村包括富农在内团结起来反对国家,而农村内部的敌我矛盾却退到第二位去。

现在我们改变了政策后怎样呢?农村的内部敌我矛盾必定会出现的,因为它存在着。农村的阶级斗争不会再被农民认为是从外部输进的生硬的口号,而会从农村内部关系中生长起来。在这个斗争中,国家当然不是中立的,那时国家在中农甚至部分小农的意识中不再是反对者,而是同盟者和朋友了。他的会认识到国家是他们在反农村资本主义分子斗争中的帮助者。

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党的组织才能成为农村大部分人的领袖,不仅在生产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在增强农村社会主义的愿望和力量的斗争中成为农民的领袖。

这些就是我给予对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批评的辩驳。

但是有些地方也出现有另一种有害的观点,即不仅未见到而且甚至否认农村有不同阶级存在。在我们的同志中可以碰到这种人,他们热衷于荷兰的或比利时的具有高度单位面积产量的农业,但是他们却忘却了荷兰和比利时农村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对农业工人的剥削。任何想把这样的生产关系搬到我们这里来的企图,都意味着以牺牲中小农来支持富农,大部分中小农也就必然反对我党。也有这样的同志,他们在考虑生产合作是否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指出比把农民联合到生产合作更好的别的社会主义形式。

我认为,对农业集体经济的误解与其说是起源于集体经济思想,不如说是起源于在实施这个思想时所犯的错误的,或者是起源于譬如说苏联实施集体化的特殊情况。这些误会是由于采用强迫入社手段时所引起的,是由于国家过于干涉合作社所造成的。因为这样农民感觉不到自己是合作社的主人。

因此党的新农业政策是要消除这些错误,并且在其实实施过程中应给那些投降倾向以打击。

(全文明日续完)

美通訊社宣傳蔣幫和南越因华侨問題爭吵

蔣介石緊急會商對策 傳美國可能出面干預

【美聯社台北5日電】蔣介石總統星期日同他的高级顧問舉行了一次緊急會議,討論他的國家同南越之間日益惡化的局勢。

自從南越宣布凡是在南越出生的華僑都得成為越南公民而毫無選擇自由以來,兩國關係就緊張起來。國民黨一再抗議而毫無結果。

星期日召開會議是由于有消息說,西貢的國民黨公使館再次遭到的騷擾,在這次騷亂中,使館的一樓遭到破壞。

官方沒有透露任何消息,但是據信,會議決定堅持政府的這項建議:在越南出生的華僑中,凡是希望保留他們的國籍和前來台灣的,都可以在台灣重新定居。

同時,台北報紙主張由美國斡旋,設法使這個糾紛獲得解決。沒有消息透露蔣和他的顧問是否決定為此向華盛頓接洽。

同時,這裡的外交部發言人江易生要求在越南的華僑通過和平的、有秩序的方法表示他們的願望。

【合眾社台北5日電】消息靈通人士今天說,美國可能被請求協助調解國民黨中國同南越之間關於華僑國籍問題的劇烈多端;這個問題使兩國的關係有破裂的危險。

這些人士說,已經有人對美國官員們進行試探。美國官員可能在南越總理吳庭艷到華盛頓以後同他討論這個問題。

美國在亞洲的這兩個主要反共盟國之間對於這一問題長時間的爭端,已經嚴重到可能使兩國的關係趨於破裂;東南亞的大約一千二百萬華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西貢和台北。

來自西貢的尚未証實的消息說,部分華僑已經開始流入共產黨的北越,因為他們在那里會受到較好的待遇。

國民黨中國立法院日益強烈地主張同南越斷絕外交關係,但是消息靈通人士說外交部反對這種過激的行動。但是今天看來中國首都的人們幾乎一致主張國民黨中國對南越採取堅決行動,否則它將在東南亞各地千百萬華僑面前喪失威信。

消息靈通人士說,某些政府人士主張請美國勸吳庭艷總理和緩他的態度。他們說,假如吳庭艷堅持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他會給其它亞洲國家造成先例,而使國民黨人束手無策。這可能促使千百萬華僑轉向紅色中國。

此間主張同南越斷絕外交關係的某些有地位的官員指出,南越對國民黨中國的友好作法從來沒有反響。雖然蔣介石政府在西貢駐有外交使團已經相當久,但是南越至今還不肯在台北設立公使館。這使國民黨人感到不快。

【中央社台北4日電】關於越南政府強制在越土生華僑歸化問題,此間十個人民團體於4日致電旅越華僑表示支援,同時並通電海外各地區全體僑胞一致展開聲援工作。

~~~~~  
一批南越華僑  
返國到澳門  
~~~~~

【合眾社澳門5日電】有二百零七名南越華僑在去共產黨中國途中在這個周末到達這塊葡萄牙殖民地。據運送這批華僑到達這裡的香港船隻,“泰波山號”駐這裡的代理人說,西貢還有六百多名華僑等待著乘船經澳門到紅色中國去。

這裡的觀察家們相信,這次華僑大批退出南越,是由于越南總統吳庭艷最近發布了一項一切出生越南的華人必須入越南國籍的命令。

五一柏林上空出現新式噴氣機

西方專家看到圖片都感驚訝

【美聯社柏林3日電】共產黨東德星期五宣稱,它的新空軍已經由俄國裝配了最新式的蘇聯戰鬥機——超音速的米格十九噴氣機。這個消息是正當盟國專家們對於東德軍隊在全國規模的“五一”節遊行時展示的新式俄國武器的規模表示驚訝的時候宣布的。

雖然匈牙利和波蘭曾經表明衛星國家軍隊能夠怎樣反抗它們的蘇聯主子,看來俄國決定把十萬人的東德武裝部隊變為有效的戰鬥機器。

共產黨宣傳說,東德加強軍備“是對西德變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個原子基地一事的答復”。東柏林的共產黨報紙“柏林日報晚刊”刊載了可以飛得很高的掠翼式米格噴氣機在“五一”節的檢閱飛行中經過德累斯頓上空的圖片,並且注明這些飛機是“最新式的米格十九噴氣機”。其他東德報紙只標明這些噴氣式飛機是東德空軍部隊。

米格十九一直被說成是俄國用來對抗美國的F一百噴氣式戰鬥機的。東德地方報紙刊載的圖片表明,東德陸軍開出新式俄國中型T五四重坦克通過馬格德堡街道。東德軍隊只在距西德邊境二十五英里的馬格德堡開出了這種坦克參加“五一”節慶祝式。

研究東柏林“五一”節慶祝式圖片的盟國專家們發現,東德軍隊裝備著許多配有以前從未見過的觀測儀器的高射炮。東德還第一次顯示了新型俄造大炮、反坦克炮和兩栖裝甲運兵車。